

## 近代中國現代化之過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 J. Toynbee, 1889-1975）在其十二巨冊的著作《歷史研究》中提出「挑戰與回應」理論，影響後世深遠。他認為任何民族、文化、組織與運動均有面對挑戰，陷入危機的時候。回應挑戰的方式直接決定危機的處理，因而產生不同的後果。湯因比認為大體有四種回應挑戰的方法：一、倒退回過往；二、對未來產生白日夢式的憧憬；三、封閉自己，以神秘經驗處理挑戰帶來的衝擊；四、面對危機，把危機轉化成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元素。中國在清中葉以後，西方列強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掠奪中國經濟利益，當時國人對列強的侵略挑戰，不外有二：一、武力對抗，企圖將外力擊退；二、增強國力，平衡雙方之均勢。前者反映的是晚清以來之排外運動；後者則是一連串的改革運動。兩者均屬湯因比所說，以神秘經驗處理挑戰的方式，而這經驗卻是中國固有的天朝觀念。

### 晚清改革的動機

中國自商周以來，華夏民族一直因文化上的優勢，鄙視華夏文明以外的夷狄（陶晉生，1988），因此傳統的中外關係是建基於「中國中心主義」和「中國人的優越感」之上，稱之為「中國的世界秩序」（約翰·費正清 J. K. Fairbank, 1968）。十六世紀中西方接觸後，中國人仍然保持這種天朝觀念，因此鴉片戰爭（1840-1842）之失敗，中國輸的並非單純一場戰爭，而是整個觀念或夢想，當時的人仍心有不甘，排外活動因而接踵而來。及到英法聯軍之役（1857-1860），中國對外戰爭連番敗北，一些開明人士心感自身的積弱，遂油然而生變革思潮，因而展開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改革運動。其時的改革仍不減天朝觀念，內容「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1861）為改革藍本，實質是「中學為主，西學為用」之變革理念。

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現代化改革之始。中國自古也曾出現變革，如：春秋時代管仲（725 BC-645 BC）相齊之改革；戰國時代秦孝公（382 BC-338 BC）的商鞅變法；西漢初年漢武帝（156 BC-87 BC）及西漢末年王莽（45 BC-23 BC）的經濟改革；以及北宋神宗（1048-1085）時的王安石變法。然而這些變法只針對單個目標：管仲變法著重富國；商鞅變法側重強兵；漢武及王莽變革重點在於經濟改革；王安石變法則兼備富國與強兵。現代化是一種根本上的（Fundamental）轉變（Change），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甚至個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連浩鏐，2007）。因此與傳統中國的變法不能相提並論。

### 現代化之定義及中國現代化的階段

學者對現代化有不同的理解，計有：一、以科學革命，增進人類智識，對傳統社會制度逐漸演化，以適應現代功能，並加強對環境控制的一種變遷過程（C. E. Black, 1966）；二、有鮮明特色的進程，不同生活習慣的人們都能感覺到其「一致的整體」（consistent whole）的現代性，其中包含「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

民主化、教育以及傳播媒介的參與，不是雜亂無章和互不相關地出現的」(S. P. Huntington, 1968)；三、能夠用高度數字化管理之資本主義社會型態的國家(黃仁宇, 1993)；四、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所發生的一種深刻變化，它既包括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明等方面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過程及其變化，也包括各個國家和地區達到、保持和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及其變化(何傳啟, 2004)。無論如何定義現代化，它的結果總表現在三方面：一、經濟上，從傳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二、政治上，從封建專制制度轉變為現代民主制度；三、文化上，從蒙昧群體主義轉變為自覺個體主義，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格。

如前所述，近代中國現代化改革始自洋務運動，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相當漫長，並非一蹴而就，它至少經過了四個階段，而每階段有成功也有失敗，然而即使失敗了，某些現代化建設亦保留下來，跟下一次現代化變革的建設成為整個現代化的成果，從這個意義看，近代中國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從 1860 年算起至今仍然進行中。中國現代化的四個階段是：一、英法戰爭結束至中華民國成立前的一連串由上而下器物技能現代化，包括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清末新政；二、革命運動至中華民國成立後，民主制度的現代化；三、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來思想、價值、行為的現代化；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大陸的兩次現代化範式轉變改革，包括 1957 年到 1978 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及 1978 年底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歷程首三階段是湯因比式面對挑戰，陷入危機時所作之回應；第四階段的現代化改革是在政治及經濟俱極度低迷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作改革力挽狂瀾而起，終卻導致邁進真正現代化之途，但成功與否現在還不能論定。若說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模仿西方科技之改革，應該沒有人異議。由於現代化社會以工業化為基調，故現代化最根本的內涵是工業化，而工業化則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連浩濤, 2007)，因此 1860 年代以學習西方科技為主的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始。

### 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

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清末新政都是中國現代化首階段的改革運動，皆在外力入侵下所作之反應：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清海軍不堪一擊，敗給「野蠻無文化」的西洋夷人，洋務運動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回應；甲午戰役清海軍又敗給自古傳承中國文化的日本，不但敵不過西洋，甚至東洋也不敵，唯有再作較徹底的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因政治原因不到百日終被全盤撤消，日、俄兩國在東北的角逐，導致列強在各地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險被瓜分之虞，同時民間排外氣氛熾熱，滿清舊勢力與民間排外力量結合，招致八國聯軍進佔北京，「辛丑和約」中國雖免被列強吞併，但條約的苛刻及賠款的數字都是歷來之冠，不但使經濟陷入谷底，清廷的統治威信也蕩然無存，清末憲政改革就是在這環境下的回應，也是滿清的一次垂死掙扎。這階段的現代化重點在學習西方物質及有形的東西，如：最初的船艦、槍炮，隨後擴及鐵路、開礦、電報、郵政等等，甲午之敗，知道只學習西

方器物是不夠的，必須仿日本，也要學習西方倡民權的「立憲政體」及開民智的教育制度與學科，但對於政治改革仍限於空談。

## 中國現代化第二階段

政體的現代化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以後的事。辛亥革命也是受到西方衝擊下的回應：清末一系列改革本是知識份子們希望藉此來增強國力，抵禦外侮，然而洋務及維新兩運動先後失敗，八國聯軍後清廷雖下詔制憲法、設國會、置諮議局，實行君主立憲政制，但經政府延宕推行的時間，人民漸對滿清政府完全失去信心，用革命替代改革來抵抗外力，成為國人心中改變國運的首選。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持的理念與改革派不同，從孫中山所創革命理論「三民主義」可見一斑，排滿興漢（莊政，1982），反清攘夷<sup>1</sup>（蕭一山，1967）是民族主義的精神；政治平等，世界大同（李旭飛，1986）是民權主義之所宗；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高力克，2011）是民生主義的目標。十八、九世紀歐洲出現了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三種思潮，「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揉合了中西思想，取長補短後而成。民族主義與西方國家主義頗類似，但它摒除國家主義的霸道與武力，用儒家王道觀以民族自決及民族結合為原則；民權主義集合了法國大革命時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及尚·盧梭（J. J. Rousseau，1712-1778）及查理·孟德斯鳩（C. L. Montesquieu，1689-1755）等人的自由和三權分立之說，但更強調人民主權與政府能力之分立（權能區分），達到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此乃按中國傳統政治重政府職能的特點而為；民生主義採用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中道，主張經濟發展應走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道路，這是傳統中國「為民制產」的經濟政策之延續。由此可見，這階段的現代化觀念融合了中西思想，較洋務運動以中學為體之改革確實為優。

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產生，結束二千餘年「朝代國家」，代之以「民族國家」，帶領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型態（金耀基，1983）。然革命力量尚薄，軍事上難與割據的軍閥抗衡，時在權力上有總統制與國會制之爭，卒為軍閥勢力以總統制劫持了革命成果，民主制度仍未落實。到北伐完成，軍閥剷除，1927 至 1937 年的黃金十年，國民政府是奉行威權政治<sup>2</sup>和國家資本主義<sup>3</sup>的國家發展模式（吳玉山，2012），不容許其他的政黨挑戰其壟斷性的政治權力，也強調要由國家引領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惜的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始終未有實行真正民主的總統選舉或議會政制。

## 中國現代化第三階段

如果說中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是邁向經濟文明，第二階段是踏進政治文明，那麼第三階段應該是新文化的確立，當時稱為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特點是

---

<sup>1</sup> 這裡的「夷」是指西方帝國主義者。

<sup>2</sup> 介於民主體制與極權政體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政治體制，主要都是集中政治權力到一個單一的政治權威（政黨、軍方、或王室），多黨雖然形式上存在，但是都無法挑戰支配性政黨的權威；政治環境受到各種限制，因此並無公平的政黨競爭可言。

<sup>3</sup> 介於市場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經濟制度，基本上生產工具是私有的，但是在所有人運用資產時，會面對國家所設定的各種誘因和限制，以調控和引導產業發展的方向。

全盤接受西方文明，對中國所有傳統文化則予以否定，故有史家界定新文化運動的特徵是反傳統主義及激進主義（高力克，2009），也有論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啟動近代中國時代轉型及思想啟蒙的一項重要運動（丘為君，2018）。整個新文化運動可分作兩個時期來說明，從 1895 至 1915 年，甲午戰後譚嗣同（1865-1898）在《仁學》中對儒家社會、家庭、個人道德規範在內的整個天理世界毫不留情地攻擊開始；到 1915 年陳獨秀（1879-1942）創辦《青年雜誌》及翌年更名為《新青年雜誌》是另一階段，《新青年雜誌》，以「改造青年的思想，輔導青年的修養」為宗旨，提出：中國社會的改造，應建基於國民（尤其是青年）的人格、素質和價值觀念的更生，雜誌對學生及年青知識份子的感染力非常巨大；1919 年五四學生運動之發生，可以講是由這些思想鼓動青年對時局及國家的關注而導致，最後反使這種新思想席捲全國，推動新文化運動發展至巔峰。

新文化運動仍離不開受外力入侵回應對外來挑戰之模式，加上以中國文化為本來模仿西方之洋務改革失敗後，大部分國人已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前述譚嗣同對儒家的攻擊便是一例；民初共和政體有名無實，兼且軍閥們推崇儒學不遺餘力，在此等環境下，對人們何以接受全盤西化及出現反傳統的思想應不會懷疑。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觀念如部分學者所指是受到激進主義之影響，只要屬於西的文化，全都無條件及盲目地接受，如民主與科學，及後來的共產主義，重要的是為了反對專制和迷信落後，運動的矛頭直指儒家學說，激進者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之類的口號。五四新文化運動因此產生了三大思想流派：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及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sup>4</sup>。

新文化運動的成效彰顯，新思想雖然未必能在經濟與政治造成即時的效應，但在社會生活上卻產生了立竿見影之效。反傳統主義使儒學在中國社會受到排斥，傳統社會觀念遂被打破，例如女性的地位不斷提升、婚姻禮俗的變遷、慈幼養老觀念的更新、求子風習及生育觀之改變；而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轉變了不少，汽車代替了坐轎、洋服代替了華服、西洋食品代替了中式食品、洋房代替了平房，雖然早期這些轉變只限於上流社會中，但隨著消費量增加，價格下降，後來連一般百姓也漸能享用。

## 中國現代化第四階段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國隨即進入國共內戰，1949 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其時中國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八年抗戰已經摧毀了很多工業設施，戰爭期間生產停頓，戰後資本短缺，企業沒法再次建立起來；內戰後新政權雖有整頓經濟之心，但共產黨向以階級鬥爭為綱領，建政後出現多場政治鬥爭，使經濟建設計劃受阻，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將中國經濟、文化摧殘得體無完膚。戰爭及內亂破壞了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改革，使中國倒退接近數十年。1978 年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的主持下，推行改革開放，中國現代化發展又再重

<sup>4</sup> 又稱新儒家/學（Neo-Confucianism），主要是抗衡當時極端的反儒思想，它將儒學重新包裝，突出其現代意義，並確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法。代表人物是梁漱溟（1893-1988）。

新出發。

這階段的現代化可分為兩部分，首部分是從 1958 至 1960 年，第二部分是從 1978 年到現在。當中共取得政權時，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不良好，由於毛澤東（1893-1976）以共產理論奪取政權，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跟共產老大哥蘇聯出現冷戰（Cold War），西方國家為了圍堵蘇聯所扶持的共產國家，中共受到各國的孤立。為了改革國內經濟，中共建政初期經常接受蘇聯的援助，但自 1956 年中共對蘇聯「去史太林化」政策的不滿而決裂，中共只可孤軍作戰。

1949 年後中共並沒有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建設，在前過渡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經濟方面允許私有制存在，政治方面由四個階級組成聯合政府<sup>5</sup>，因此從 1949 到 1953 年，中國的經濟有很好的發展，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24.45%。1954 年開始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時期的主要目標是使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及消滅私有制，確立公有制。1958 年在缺少蘇聯援助及由毛澤東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建設瞬間上馬，當時稱為「大躍進」運動，目標是：一、高速發展經濟；二、達到自力更生；三、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在工業方面主張「五並舉」：即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土法生產（中間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與洋法生產（先進技術 advanced technology）同時並舉。在農業方面，廣泛推動農業生產合作社，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即「大」型及「公有化」程度高的組織、1957 年秋收後實施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運動、1958 年下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運動。不幸是從 1958 到 1960 年的「大躍進」運動，由於實行不得其法，一切建設操之過急，地方又虛報生產數量，釀成全國大飢荒，1960 到 1962 年間有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人死亡。總體而言「大躍進」並非一般的現代化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並藉群眾力量及「階級鬥爭」手段來實行現代化之目標。

隨著「大躍進」的失敗，上層政治鬥爭越演越烈，1966 至 1976 年達到巔峰，造成中國現代史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後社會經濟凋零，政府缺乏資金，生產及消費低迷，百姓生活艱苦。當時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模式，特徵是：一、中央計劃商品的生產與分配；二、沒有民營企業，國營企業成為經濟主體；三、商品價格由政府決定，市場制度不再出現。在浩劫後貧困情況壓迫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只有改革不可，第四階段現代化的次部分旋即展開。鄧的改革重點在經濟方面，方法是改經濟運作為市場經濟及引進外來投資，通稱「改革開放」，藉以搞活經濟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引入利潤誘因激勵生產活動。農村改革方面有二：一、將生產合作社的指令經濟轉化為以「承包制」（contracting out system）<sup>6</sup>為基礎的經濟；二、農村副業的復興與鄉鎮企業的出現。從 1979 到 1984 年，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50%。在同一時期，糧食生產的年均增長率達 4.80%。企

<sup>5</sup> 四個階級是工、農、小資產階級（小商販、知識分子、手工業者等）及民族資產階級。

<sup>6</sup> 國家把土地劃分給農民經營耕種，雙方協定一個生產指標，若產量超過協定指標，則超標部分的農作物歸農民所有，從而達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之結果。

業方面之改革，1979 至 1980 年間創立了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市四個經濟特區，目的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採取「放權讓利」<sup>7</sup>制度，引進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容許私人開辦企業，增強企業的競爭環境，1990 年代初，大規模地出售國有企業，「國（企）退民（企）進」之勢一時成為佳話。整個改革開放使中國人均國民所得從 1978 年的 379 元增至 2003 年的 8,469 元，1979 至 1990 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 9.70%；1991-1994 年為 11%；1995 年以後為 7%。上述數字充分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卓越成就。

## 兩岸現代化的分途

若問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化有何成果？答案應該是得多於失。中國從一個與外界隔絕，相對落後及自給自足的國家，演變成今天在國際上舉足輕重，國民所得位列世界第二位，西方文化，如飲食、衣著、生活等在中國廣被接受的國家。但是這些轉變尚嫌不足，一個現代化國家除了經濟富強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的公正及社會的平等都是很重要的。當然清末以來無論在民主，法治及平等各方面已有改善：君主專制制度取締了，法院及律師制度替代了官僚審判制度，男女地位平等亦得到認同，但這還是有不足之處。首先，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仍有差距，主要是各項選舉並非全民票選；其次，法律並非獨立於行政，因此法治無法達到公正；再者，階級觀念仍重，尤以官僚方面，社會難有真正的平等。

中共建政後七十多年間，中國從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走進極端社會主義，由此摧毀了過去現代化的成果，幸而後來之改革開放，中國重新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令國家富裕起來，但經濟改革的背後，仍須要有政治改革以資相輔。內地學者張維迎認為，改革開放分為兩部分，前部分是經濟改革，後部分是政治改革；若以 1980 年作為改革之起點，前三十年 1980 至 2010 年是經濟改革，後三十年 2010 至 2040 年是政治改革，當整個改革完成後，恰好是中國門戶被武力開啟的鴉片戰爭二百年<sup>8</sup>。

遺憾是經濟方面，2008 年後中國出現了「國（企）進民（企）退」的倒退現象，大量貸款給予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強迫性收購民營企業，加上政府濫用經濟調控政策干預市場運作，似是朝計劃經濟的回頭路走；政治方面，2018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結束國家主席兩屆任期的限制，這意味回歸領導終生制度，從這個意義看，政治改革不但裹足不前，而且出現極大之倒退，距民主制度又後退了一大步。

反觀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1950 年代開始發展經濟，初期政策上仍帶濃厚的國家資本主義色彩，如限制外國貨品入口，保護國內工業；後來改行經濟

---

<sup>7</sup> 企業在完成國家生產計劃後，可按市場需求，增加生產，自行定價銷售，並保留部分利潤。此舉能擴大企業自主性，提高生產力。

<sup>8</sup> 見張維迎著「把脈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革」載於《市場的邏輯》，2012 年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P.384 及 P.386-387。

自由化<sup>9</sup>，期間實行三大政策：一、發展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二、從調整行政，司法，教育等制度出發改善投資環境；三、尊重市場機能的運作，減少行政干預，最終台灣於 1970 年代，躍升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77 至 1985 年間平均經濟年增長率達 7.91%。自始中華民國擺脫了 1930 年代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邁進市場資本主義年代。1949 年的民國政府延續了現代化威權的政治體制，一方面實行「動員戡亂」的軍事狀態，控制百姓的言論及自由；一方面維持一黨專政。直至 1987 年解除戒嚴令及開放黨禁，民主步伐加速；1996 年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的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及副總統，完成了民主憲政之路；2000 及 2008 年更分別出現兩次政黨輪替，自此在台灣的中國人不但享受到自由民主的政體，而且在社會與世界先進國家完全接軌下，成為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中國人。

2022 年 10 月 18 日

---

<sup>9</sup> 1973 至 1990 年是台灣經濟自由化時期。